隘勇線社會行醫的牧羊人：井上伊之助《生蕃記》研究[1]

柳書琴（台灣・清華大學）

一、前言

井上伊之助（1882-1966），日本高知縣人。1906 年，花蓮港廳太魯閣族部落聯合襲擊樟腦作坊，導致日籍支廳長在內 30 餘人被殺害，史稱「威里事件」，井上的父親亦為遭難者之一。爾後井上基於「用愛復仇」的誓願，在 1911-1917 年深入新竹州竹東郡 Mklapay（カラパイ）、Mkslaq（シラツク）等社，擔任公醫，長期奉獻於台灣，直到 1947 年 4 月返日為止，被尊稱為「台灣原住民醫療與宣教之父」。1924 年井上選錄他當地的日記、原住民研究論文、隨筆、書信，透過賀川豐彥等人幫助，於 1926 年在東京出版《生蕃記》[2]。該書出版後對沖野岩三郎、山部歌津子等作家產生不小影響。1931 年山部以井上父子為模特兒，汲取《生蕃記》中所述風俗而創作小說《蕃人ライサ》（《蕃人賴薩》）。[3]

下村作次郎最先將幾乎被遺忘的《生蕃記》與《蕃人ライサ》連結在一起討論，他認為山部不熟悉台灣山地情況，導致與《生蕃記》中對原住民的理解相差甚遠。（2000）與下村相反，東のぞみ則從基督教土著教化與殖民地支配的共謀關係，指出井上缺乏「**對生活遭受殖民統治脅迫不得不抗日蜂起的原住民之現實**」之視野。（2004）第一位對《生蕃記》專文分析的黃國超，則從批判醫學殖民與傳教士民族誌之角度，指出《生蕃記》沿襲了後藤新平的生物學統治原則與原住民教化理念，認為井上的「**種族進化論色彩的帝國醫學觀點**」和仁慈論述，恰是公醫、警察、樟腦公司構成的「帝國殖民三角關係」之一環。（2004）落合由治承續下村提出的文學影響論，但質疑下村「**《生蕃記》中可以看見對原住民深刻的理解**」之看法。她認為，井上仍不脫指導者、拯救者、宣教師立場，山部反倒能避開原住民信仰和基督教之糾結等老生常談，探索賴薩現代文明的學習與其確立泰雅族信仰之間的關聯。（2009）潘佩嬬則認為《蕃人ライサ》為霧社事件後第一本觸及該事件，並從蕃童教育、內台共婚、樟腦林業等面向，全面反思理蕃政策的作品，從中亦可見到日本基督教人道主義者的殖民主義批判傳統。（2011）

近二十年來研究者對《生蕃記》褒貶不一，《生蕃記》受到嚴峻的檢視，《蕃人ライサ》

[1] 本文為科技部「高山探險文本、殖民地觀光媒介與台灣原住民族再現」專題研究計畫（106-2410-H-007-083-MY2）」部分成果；海外宣讀期間承蒙「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特色領域研究中心─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補助，謹此致謝。

[2] 井上伊之助《生蕃記》（東京：警醒社書店，1926 年 3 月）。中譯本收錄於石井玲子譯《台灣山地傳道記：上帝在編織》（台北：前衛，2016 年 7 月）。

[3] 山部歌津子《蕃人ライサ》（東京：銀座書房，1931 年 2 月）。

的評價則越來越高，其標準取決於對原住民社會處境的理解及文化詮釋是否恰當。這樣的立場值得肯定，但偏向意識形態決定論，對井上要求嚴苛，對旁及了霧社事件但行文中對原住民文化多所曲解的山部給予過高評價。筆者認為，《生蕃記》是第一部公開從宗教層面檢討理蕃政策的先驅，也是從日本人他者立場真誠地「再現馘首文化」的珍貴著作。在有關此書的神學研究、殖民醫療、基督教教化、霧社事件批判等理論性反思展開的此時，從新歷史主義角度強化基礎研究格外重要。筆者希望借助日本人他者進入台灣隘勇線地區生活的記錄，考察深入接觸區的日本人在既定種族身份、社會角色下，遭遇了哪些生活上與價值上的挑戰，同時側面了解當時台灣原住民族的生活。為此本文提出「隘勇線社會」的概念，以《生蕃記》為中心：首先，將井上公刊日記與同時代同山區之討蕃紀行文進行比較，重建當時的入山交通，以及井上不同於官、軍、警人士的動機與視野；其次，繼續以日記為中心，整理井上的地方生活圈及透過醫療與原住民建立關係的過程。最後，整理井上對尖石前山隘勇線內馘首事件的觀察，並參照其餘零散日記及他與幾位「蕃通」的往來文章，重現《生蕃記》在禁教法規與言論出版限制下傳出的聲音——他對隘勇線討伐政策的反對、改善意見和傳道主張。

二、內灣溪上流隘勇線的入侵：從白虹生〈討蕃慰問紀行〉所見

本節透過白虹生描述台中慰問隊進入內灣溪上流勞軍的紀行文，了解 1910 年新竹廳尖石前山地區的隘勇線入侵概況。〈討蕃慰問紀行〉[4]為 1910 年 10 月 9 日至 19 日連載於《台灣日日新報》的一篇報導文學。根據筆者調查，白虹生並非一般記者，曾任台灣日日新報社支配人等要職，為活躍台灣近 40 年、極富影響力的日本媒體人，曾多次以特派員身份跟隨軍政要員或討伐隊深入山區觀察。他的蕃地討伐紀行文，集中發表於《台灣日日新報》，〈討蕃慰問紀行〉首篇作品。在白虹生眼下，新竹廳乃至整個台灣丘陵及山區，似乎是由一道道隘勇線畫出的空白地理，無人（或非人）的世界。在他以「隘勇線前進」構成的社會理解和地方感中，壯麗的山脈水域森林是無所屬的，台灣人隘勇或日本士兵們命在旦夕的生活也是浪漫的。他嘲笑蕃人野蠻無知，認為「假投誠者」不容寬宥；為開發山地富源、討伐原住民族實屬必要。他的觀點幾乎就是台灣總督府的主流觀點。弔詭的是，白虹生這篇彰顯軍警武力的文章，時至今日反而毫無疑義地證明，殖民者自始即以「戰爭」推進隘勇線、掃蕩原住民的事實。而這一點正好與藤井志津枝、近藤正己等學者大力主張的「**理蕃討伐實為日本帝國在台灣山地的另一場殖民地戰爭之觀點**」不謀而合。那麼，相較於台灣總督府的主流觀點，一年後進入此山擔任公醫的井上伊之助會有什麼不同嗎？

三、1910 年代前期的 Mklapay 社生活圈：井上伊之助的隘勇線生活日記

《生蕃記》第一章選自他在武羅灣和加拉排的日記（1911 年 12 月 21 日-1916 年 12 月 25 日），本節嘗試從一位日本公醫的生活圈，了解 1910 年代 Mklapay 社周遭的部落狀況與族群關係，以此呈現該地的隘勇線社會。

[4] 白虹生〈討蕃慰問紀行〉（一～六），《台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0 月 9、11、13、14、15、19 日，第 7、5、5、5、5、4 版。

井上入山後生活在陸續攻建的內灣溪上游隘勇線及李崠山隘勇線內，是第一位進入尖石前山地區的醫生。綜合加拉排日記，可以窺見他當時的兩個生活圈—內山蕃界與外圍城鄉。面向外部，他的主要力氣用在連結教友；面對內山，則不遺餘力透過醫療與語言學習，建立與部落頭目和一般原住民的關係。如果說白虹生以「隘勇線前進」形塑了他的國家地理觀與原住民治理想像；那麼，井上則是甘冒全家遇害的風險在此地生根，並積極認識這片殖民與被殖民者緊張接壤的「隘勇線社會」，盼望和平降臨斯土的人。

日記著重呈現醫病關係的建立與原住民傳道工作的鋪路工作。透過日記可知：蕃人療養所主要為對原住民看診，也須到加拉排、西拉克、麥樹仁等部落出診。1912 年應加拉排頭目請託前往開墾地診治，以及登上險要地為西拉克頭目治病，為重要突破點，此後延醫者日多。到職一年左右已有婦女出面求診，也開始進入部落借宿以便一次巡診多人。井上衷心想成為原住民的朋友，也希望更多人理解原住民，以便官方許可傳道，這一點從他不斷帶外客（特別是教友）進部落參訪可見一斑。1913 年 2 月 19 的日記中，出現了第一次接待外地宣教師參訪的紀錄，1914 年以後類似情況增多。

井上依誓願入山後，從備感壓力到致力宣揚原住民優點、推動合法傳教到籌備小型蕃童學校，甚至在《生蕃記》序文中大聲疾呼，成為第一位以「高砂族」取代「蕃人」、「生蕃」等歧視性用語者的倡導者。他的立場與視線明顯不同於官方。六年半間，如此巨大的改變是如何發生的呢？我認為與他在隘勇線特殊社會的見聞與作為有關。

四、對馘首者傳道：《生蕃記》中的風俗批判與原住民接觸

長期生活在隘勇線封鎖地域，井上可曾思考過隘勇線前進與馘首層出不窮兩者的關係，是本節探討的重點。

威里事件改變井上一家人的命運，也衝擊了台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佐久間總督於 1907 年終止圍堵政策，改弦易轍進行「五年理蕃計畫」（1910-1915），積極推進隘勇線。1911 年 12 月井上抵達武羅灣時，台中慰問隊離去年餘。自 1907 年馬福社等隘勇線一波波侵入迄今已四年，各社多年積恨臻於高峰。井上在李崠山隘勇線推進（1911 年 10 月）完成的第二個月來到此地，住在入山要塞之武羅灣監督所及加拉排駐在所旁，在其後的數年間，完整見證了馬里可灣隘勇線（1912）、西納吉隘勇線（1913）、霞喀羅隘勇線（1917）的推進。耐人尋味的是，1917 年也恰是井上罹病被迫辭職，黯然離開加拉排的那一年。更值得注意的是，《生蕃記》鮮少提起隘勇線推進情況，僅旁及三次消息，顯見對此議題的談論並不自由。不過，即使根據有限的側面記述，仍可看見井上以「戰爭」看待隘勇線推進之觀點。他雖迴避隘勇線議題，但密集關注馘首消息，呈現各種類型，在公刊日記的第一年中就有十次記載。

分析這些記載可以發現：《生蕃記》通篇使用「馘首」，而不用獵人頭、砍人頭、取人頭等俗稱。筆者認為，井上透過日記親切卻帶有擬真性的體裁，向讀者揭示了幾個嚴肅訊息：第一，1911 年底到 1912 年底這段時間為內灣溪上流隘勇線內原住民出草的高峰期。第二，出草類型包括：對新竹製腦會社腦寮工人及家屬（含日、台人）、對政府隘勇線統治機關（監視所巡查及使役等）、對一般本島人等三種。第三，針對警察的出草，地點集中在李崠山隘勇線前沿的合流山、太田山沿線，以及位居馬里可灣隘勇線（1912）對外吞吐口之尖石監視所附近。針對腦寮的出草，地點同為隘勇線前端的深山腦寮。這兩類型的起事者來自隘勇線外，

計畫起事或隨機可動的都有。第四，前兩項出草中，包括個別性與集眾性出草，其中殺警或企圖破壞武備設施者，有明顯的抗日或報復意圖。第三類，線內歸順者對台灣人馘首的事件只有一起，可能為泰雅族青年成年期的馘首。整體看來，1912 年間，李崠山線和內灣溪上流兩線的內部大致平穩，但其周邊與前哨地帶則遭受線外原住民頻繁的威脅；而不論哪一種類型的馘首，井上都從「殺人」、「凶手」、「惡習」等道德層面進行批判，未涉及理蕃政策檢討，也欠缺從原住民社會文化需求進行理解的視野。

日記中呈現的 1912 年的井上觀點為——馘首是「卑劣的事」、「**不善良**」、「**不和平**」、「**惡習**」、「**惡的計畫**」，是「**無知的**」、「**嗜血的人種**」所造的「大罪」。不過，這樣的想法在 1925 年《生蕃記》出版時卻有明顯改變。證據之一，為第四章收錄的〈蕃人研究〉一文。1923 年 8 月發表在《聖經の研究》雜誌的這篇論文，在「馘首是最高法院」、「馘首羅曼史」兩節，從原住民族傳說和社會具體案例介紹了馘首對原住民社會的意義和價值。證據之二，為比對當時報紙可知，日記中的馘首事件並非該年全部事件，井上選擇的目的在襯托其前後改變，證明馘首可以經由醫療、關懷、教育、傳道等介入，移風易俗。

筆者透過未收錄在《生蕃記》的其它零星發表日記發現，井上雖屬統治階層一員，但非軍非警，只是一般職員，且是他主動向官廳請求進入隘勇線前沿服務的。1917 年井上離台時，森丑之助特別為文肯定他非比常人的精神。〈給離開加拉排的井上伊之助君〉一文，將井上在加拉排的作為與隘勇隊討伐隊對比，強烈地諷刺了武力討蕃政策。筆者認為，井上將它選入《生蕃記》，暗示了自己同樣的「反討蕃」立場，正是他多種巧妙的編輯策略之一。

井上與森氏的長年友誼，也充分顯現在森氏過世三週年時，他發表的追思文中。他向友人報告自己仍在以為然蕃地傳教合法化孤軍奮鬥，也和十幾年前一樣障礙重重。文中，他特別提到「**不流血的同化**」，再次巧妙傳達出兩人過去對理蕃問題的共識。事實上，井上不只與「蕃通」森丑之助有所交往，從入山伊始就獲得武羅灣監視所的緒方警部在泰雅語方面的協助。緒方正基（？-1924），是日治初期最活躍的「泰雅理解者」之一、日本治台後第一批山地警員，也是第一批泰雅語通譯者中的佼佼者。而緒方與森丑之助也是長年知交。森氏曾在緒方過世後一年，寫過追念文，提到 1897 年台灣總督府首次舉辦「蕃人內地觀光」時，緒方擔任隨行通譯的往事。緒方可謂井上在台的最初貴人之一。井上抵達武羅灣的第二天，就在他幫助下開始接觸泰雅人、學習泰雅語；而緒方請井上協助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前往部落診治瘧疾患者，1913 年緒方更為不具警察身份的井上爭取到參加角板山「第一期蕃語講習所」研習的機會。《生蕃記》首先於序章追思亡父，第二章以森丑致井上一文為始，終章則以井上緬懷緒方先生一文為終，可見兩人在其原住民工作中的重要性及志同道合之情。

根據上述層面的分析可知，井上確實了解隘勇線推進與馘首風俗之間的相關性，並極力以他的方式避免更多的流血衝突與馘首事件。在緒方先生追思文的最後，也是《生蕃記》全書終篇以前，井上特別以日語旁標注泰雅語的方式寫到：「**我確信他已跑完當跑的路，織完工**

作（Masuq Tminun），越過彩虹橋（Hongu Utux），得到耶和華的許可安息了。」藉此再次隱密而堅定地提出他的根本主張——以基督教取代馘首是泰雅人走向「彩虹橋」的新道路。

總督府蕃務署職員森丑之助、警部緒方正基、公醫井上伊之助，三位「蕃通」都是理蕃機關內部的異議者。他們對泰雅族或其它台灣原住民族的理解來自下列原因：第一，通譯出身，精熟原住民族語言；第二，長期奔走於山地，或因職務等因素居住在隘勇線社會；第三，為理想主義者或有宗教信仰。他們雖隸屬於統治階層，服務於台灣總督府政府組織或周邊團體之內，但是原住民語言的習得和深入隘勇線社會的經歷，使他們和沒有這種經驗者，或者漢文通譯出身的台日報社長白虹生、家永新竹廳長等人對待原住民族的觀點截然不同。1915 年 5 月布農族大分事件後，森丑之助大膽倡議與五年理蕃政策南轅北轍的「非鎮壓式的理蕃事業」，並主張「賦予原住民自治權」。在《生蕃記》最後懷念緒方正基一文，井上也提到「獨立自給主義」，顯然「非鎮壓」、「不流血的同化」、「蕃族獨立自給主義」正是三人共識。